

云南行

巴 阿



责任编辑：王寿春

封面、插图：何德光

云南行

田间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1982年11月第一版 198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950

统一书号：10116·926

定价：1.15元

前 言

大约是今年上半年，我接到云南友人王寿春同志的来信说，与其单独印行“长诗三首”，不如把我写云南的诗汇集在一起，并为我拟名《云南行》。

“长诗三首”的写作，我是在云南住过半年，并走过云南大半个地区，有所感而写的。此外，《芒市见闻》，除了我对傣族人民的喜爱之外，还有周总理的音容在内。其中有一首诗：《致一位政治家》，就是正当周总理出国平安回到边疆之后写的。写芒市的当时，我曾参加中缅两国领导人的会见。这次会见，是边疆史上的一次大事，值得记载。我国的边疆，在高山大川之间，在长河峻岭之边，各族人民，辛勤劳动，休养生息，以他们的汗水，哺育过无数的奇花秀木，若遇侵略时，则以他们的血水，写成了胜利的红字。

正是——千里边疆，万里诗行。

正是——祖国儿女，钢铁城防。

我的笔，虽然笨拙，但寸心欲狂。我先后访问过内蒙古自治区，也曾访问过甘肃和新疆等地。各族人民对我的帮助，此生难忘。胸中澎湃，笔端沸腾，总想要为边疆人，为我们的爱国者们，写下我的心中话。同在一个蓝天下，共守一枝祖国花。

爱国者呵，祖国所爱。在所有的奇花秀木中，在古老的
芬芳的泥土上，那奇花秀木，种植在人民的心中，和祖国的怀
抱中。在此，请让我附录一首《爱国者》以相赠：

一

爱国者呵，心似花城，
杜鹃殷红，巨树长青。
斗志永难相忘，
芳香永无止境。

二

千里行程，万里诗行，
壮士之志，志在四方。
站在高山一望，
月明弩响刀亮。

三

祖国唤你，你唤祖国，
无名河畔，新栽翠竹。

一旦攀过山去，
就可找到金谷。

——我向爱国者寄语，
前行的太阳之路！

作 者

一九八一年国庆节

田间《云南行》序

晓 雪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诗人田间来到昆明，当时正在举行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工作会议。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大家庭。兄弟民族很多，各民族都盛开着文学的花朵。云南地区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在这一个文艺领域里，正面临着百花齐放的季节。

“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来到昆明。我是到这里来学习的……”他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赢得了全体到会同志的热烈掌声：

“边疆的歌手们，你们是生活在一座金山的旁边，你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时代，我祝贺你们的工作，收获丰盛。纳西族有这样的谚语：假如你是纳西人，就要尽情歌颂自己的民族。

“边疆的歌手们，让我们记着这句话，尽情地歌颂自己的民族，歌颂自己的祖国吧！我决心在这里向你们学习，和你们站在一起，和你们合作！”

当时，我也是在台下为田间同志的讲话，拼命鼓掌的听

众之一。这不仅因为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田间同志，是我早就熟悉和尊敬的著名诗人，过去一直没有机会见面，这次见到了，特别兴奋和激动，更因为诗人对我们云南，对祖国边疆，对边疆各族人民的崭新生活，对各民族的民间文学遗产，怀着如此深厚的无比热爱、无限向往的感情，使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我们相信，诗人怀着这般强烈、饱满、深挚的感情来到云南，来到边疆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间，来到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的海洋里去漫游，他一定会同“边疆的歌手们”“站在一起”，“尽情地歌唱”，一定会写出许多歌颂边疆各族人民斗争生活的优美诗篇来。

果然，诗人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他这次到云南，一住就是半年多。他到芒市，参加了那里的边民联欢会；他又去到玉龙山下，访问纳西族的歌手和诗人；他流连忘返于美丽的苍山洱海之间，为白族人民的嘹亮的山歌和神奇的故事所陶醉；他在风景如画的西双版纳，在傣家的竹楼上，听赞哈的歌唱；他登上险峻雄伟的阿佤山，同阿佤兄弟和拉祜青年促膝谈心，……优美的传说，动人的歌声，多采的生活，丰富的感受，和许许多多边疆各族人民的斗争故事和英雄业绩，使我们的诗人不能不立即挥笔抒写、放声歌唱。真是“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人觉得光写几首短诗，已经远远不能展现他的丰富感受和壮阔情怀，便在回到昆明之后，住在安宁温泉，一口气写下了三首长诗：《丽江行》（一九五七年三月）、《阿佤人》（一九五七年四月）、《龙门》（一九五七年五月）。三个月内，除写了十多首短诗之外，一个月完成一部两千余行的长诗，三首长诗加起来近七千行，这

样高的创作热情、惊人速度和丰硕成果，不仅在诗人自己的创作道路上是空前的，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值得赞许的。

一九五七年，三首长诗先后在《诗刊》、《收获》和《边疆文艺》上发表时，我曾很兴奋地读过。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将《长诗三首》合集出版，我又读了一遍，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印象。现在，隔了二十多年之后，云南人民出版社又将这三首长诗，加上诗人写云南的其它短诗，（包括一九五七年云南出版过的短诗集《芒市见闻》，和另外几首短诗）合编一集，名叫《云南行》，重新出版，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这一本长短诗集《云南行》，不仅显示了诗人田间五十年代中期来云南半年的创作实绩，表达了诗人对祖国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无比热爱的深情厚意，和他努力歌颂社会主义时代各族人民生活巨变的高度热忱，而且是诗人建国三十多年来的全部创作中独放异彩的里程碑，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诗创作中一部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有份量的书。

读着《云南行》里的一篇篇长短诗，首先使人想起产生它的那令人怀念的美好的年代。那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开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在得到贯彻，工农业生产和思想文化战线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在党的正确路线的光照耀下，祖国边疆民族地区也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生日新月异的可喜变化。人们思想活跃，心情舒畅。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九五六年）的冬天，友好邻邦缅甸的总理，应邀来到我国云南边疆的小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芒市，同我们敬爱的

周总理会见，两国边民在芒市进行和平友好的大联欢。……诗人在这样的美好年代和美好季节里，来到云南，来到芒市，在这样的美好年代和美好季节里，同各族人民一起欢笑，一起歌唱，所以他的诗，正反映了那美好年代、美好季节的气氛、风貌和光彩，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欢乐情绪、多彩生活和精神境界。这一点，我们不仅在几部长诗中可以看出，就是在《芒市》、《孔雀从四方飞来》、《给白鹤》、《芭蕉和甘蔗》、《大青树》、《克钦邦的人》、《界碑》等等短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那边有一群白鹤，落到我们这一边，它们路过我们的竹楼，喝下了几口甜水。这里有一片山湖，湖边长满了芭蕉树，树上的露水晶亮，湖里的清水香甜。”“白鹤飞过的山谷，是一条花的山谷，几百里的太阳光，向你们打着招呼。白鹤呵我的朋友，希望你多住几宿，我们从来都是这样，要为和平的邻居祝福。”（《给白鹤》·一、二）

“高高的大青树，在边疆成了林，一层层的枝叶，伸展在高山顶。枝叶垂挂在地上，在地上又生了根。根呀，根儿相连，叶呀，叶儿相亲。”“高高的大青树，是绿色的帐幕。绿油油的枝叶，搭起一座天棚。它伸到高山尽头，它在山边站住。它爱自己的祖国，也爱它的朋友。三、在这自由的天棚，在这绿色的帐幕，四方的飞鸟来吧，唱一支和平的歌！”（《大青树——边民联欢曲之二》·一、二）

这样的诗，在大叫“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和平鸽”不许再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平礼貌边疆被当作修正主义大批特批的年代，

当然是不会写、不敢写，写了也发表不出来的。然而事隔二十五年之后，今天我们来重读，却仍然感到亲切新鲜、生动感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情绪、愿望和要求，因为它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心声，它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人之言，却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诗。

滇池是你的砚台
云彩是你的纸张
你的笔要千变万化
还要有明确的思想
要说老百姓的话
把老百姓的话写上

你的笔你的思想
要象月月红那样
你的脑筋你的手
不要象枯草那样
不要高谈阔论
不要要那种空腔

这是长诗《龙门》中诗人劝“魁星”的诗句，也正是诗人自己的主张。真正的诗人，对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对败坏诗的名誉的种种假大空的流风，总是非常厌恶并坚决排斥的。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中，诗人田间自己保存的《长诗三首》曾被“造反派”抄去，他们在上边引的诗句，和其他许多精彩的诗句旁边，都打上各种记号，把它们列为诗人搞修正主义和“思想反动”的罪证，这

倒恰好显示了这些诗篇的战斗力和思想艺术价值。这表明：以写《给战斗者》等诗而出名，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用诗的武器出色地战斗过的著名诗人，在社会主义时期仍卓有成效地战斗着！

所以我认为，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努力以诗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云南边疆各族人民生活巨变和他们的情绪、愿望，而又处处洋溢着“时代鼓手”的饱满的政治热情，洋溢着诗人热爱云南边疆、热爱少数民族、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深厚感情，是《云南行》这个诗集的第一个特点。

诗集的另一个特点，是诗人总是力求把传说和现实结合起来，把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劳动和斗争结合起来，把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理想和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使他的诗篇（特别是长诗）具有更鲜明的民族色彩，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具有更独特、更突出的民族性格。

关于《龙门》、《丽江行》、《阿佤人》，诗人在《从歌海归来——〈长诗三首〉代序》中说：“这三首长诗，都是写劳动以及社会主义的种子怎样播种在边疆地区的。

《龙门》和《丽江行》还涉及到劳动和爱情的关联。”其实，不光是《龙门》和《丽江行》涉及到劳动和爱情的关联，《阿佤人》也同样涉及到劳动和爱情的关联。而且三首长诗首先“涉及到”，或者说是突出地表现了并强烈地给人留下印象的，还是人民为追求幸福生活、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作的斗争。

《阿佤人》和《丽江行》集中反映的，更是佤族人民和纳西族人民在新时代的觉醒，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使“一个黑

暗的时代，永远退到地下”所作的斗争，以及他们怎样终于获得了自由、解放和新生，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

他们看见了自己，
也看见了一个民族；
他们看见了祖国，
也看见了一个世界。

——《阿佤人》

祖国赤红的朝霞，
照耀在水电站上，
照耀着兄弟民族，
和我们这个时代。

——《丽江行》

同样是从苦难走向新生，从黑暗的旧世界走向光辉的新时代，纳西族和佤族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等情况不同，所以阿海妹（纳西族）和娜妹（佤族）的斗争方式、具体经历、爱情生活以及民族心理和个性特征也是不同的。田间同志说：“我要写的东西，一般说，总是自己接触过的，哪怕是接触得少些。这要比不接触的好。”（《从歌海归来》）由于他坚持这一条，坚持写自己熟悉的或“接触过”的东西，所以他写云南少数民族生活斗争的这几部长诗，就绝不是一般化的，而是从内容到形式，从环境描写到人物形象，都有着各不相同的民族特色。对于一位并不是长期生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诗人来说，一开始就注意并尽可能地做到这

一点，是多么不容易啊！

在形式上，在语言风格上，大量吸收云南各族民歌的营养，力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是诗人田间在《云南行》的创作中着意追求的，也正是他这部诗集的又一个特点。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田间是特别注意向群众的语言和民歌学习，特别注意致力于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多部头长篇叙事诗《赶车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果。如果说，《赶车传》由于题材、体裁的不同，其中有的语句、句子还似乎主要依据于汉族民歌（当然也有其他民族的），多少带有探索性质的话，那么，《云南行》中的三首长诗较之《赶车传》就有另一方面的新的活力，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新成就。

在《歌海中归来》中，诗人说：“既然是写斗争、劳动，和爱情的题材，要写群众的感情和希望，那就更不能不受民族的影响，不能不采用群众的语言。诗歌的形式，基本上也必须和他们的格调相近。”他把云南边疆比做一个“歌海”，他把自己创作的三首长诗，比做“只不过是歌海中的一滴”，他兴奋地唱道：“从你的歌海里面，我拾到一颗珠子；我把它放进行囊，要把它献给祖国。别看它体积不重，因为它是颗珠子；它使我的行囊，也灿灿地发光。”事实上，由于诗人是如此虚心地、自觉地、勤奋地向云南各族民歌学习，他从歌海里拾到的绝不仅仅是一颗珠子，而是很多颗璀璨晶莹的珍珠，这些珍珠都被放在该放的地方，恰到好处，自自然然，所以使他的诗篇也“灿灿地发光”。我们看

《阿佤人》第七章《在泉水边》，这是佤族少女娜妹同她的
情人的对唱：

“你看那三岔路口，
长着三颗芭蕉树，
在这三棵树的上面，
站着三只斑鸠，
岩郎你要挽起袖口，
张开你的弓射去——
那斑鸠的膝子里，
就藏着三颗绿豆，
你要拿到绿豆，
你就来把我领去。”

岩郎摘下山花一朵，
回答娜妹的歌：

“.....

一条山泉叮咛响，
好象是你唱的歌，
只听见它的声音，
我的手拿不到它；
你的歌声好象风，
从我的身边吹过；
只听见它的声音，
我的手捉它不住。”

娜妹她笑了一笑，
朝向泉水这边走：

“不是一阵风吹过，
是一只斑鸠飞过，
斑鸠要来喝水呀，
她从树上飞下来。
她的脚趾象红崖，
她的毛羽象水珠，
勇士，我的勇士呵，
斑鸠你也捉它不住？”

这是多么朴素自然、饶有风趣而又富于民族特色的诗句。而三首长诗几乎都是用这样的语言或接近于这样格调的语言写成的。可以看出，诗人大量地吸取了各族民歌的营养，甚至直接采用了民歌中的某些比喻、某些句子和格式，但又绝不是简单生硬地照搬或套用，而是根据内容的需要，经过消化和再创造，所以也就不是原来的民歌体，而是诗人独具的风格了。例如写娜妹给解放军送信那一段：

她把暴风推开，
走在暴风的前面。

她好比一声雷，
隆隆穿过山野。

她象一面旗子，
伴着雷声闪电。

看啊，从云海里，
升起一个浪头。

看呵，从山谷里，
升起一支火焰。

她是旗，她是火焰，
她是雷，她是闪电，
暴风退在她的后面，
乌云退在她的后面。
阿低山虽然很高，
在她的脚步下，
好象是一块石片，
也感到自己懦弱。

从这样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不拘泥于某一种民歌的形式，而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根据抒发感情和刻画人物的需要，不断变化他的形式的。从这样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出《给战斗者》的作者，是如何既注意吸取民歌的营养、致力于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而又保持自己不断发展的艺术个性和一贯风格的。

作为用叙事长诗的形式反映纳西族和佤族人民当代现实斗争生活的最初尝试，《丽江行》和《阿佤人》（把昆明地区关于龙门的传说写成叙事长诗，《龙门》也是第一部）取得的成就是难能可贵的，但自然也还存在某些不足。如作者的创作意图：“社会主义的种子，怎样播种在边疆地区”，也许可以说，还未达到作者完满的愿望吧？诗中某些章节似可写得更精练些，个别的字句，也还是可以再斟酌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诗人自己在他的诗集《给战斗者》（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引》中的一句话：

“——我们不要只记得过去，更要紧的是前进，和人民、和生活一同前进。并要努力作新时代底主人！”

现在，经过十年磨难之后，我们的党和人民又早已回到了万象更新的春天，我们的文艺和诗歌真正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季节”。我们希望，同时也完全相信，我们的诗人田间会“和人民、和生活一同前进”，为我们的时代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来！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于昆明